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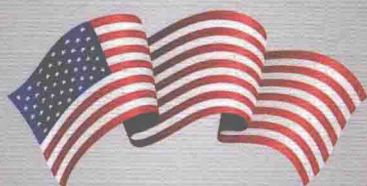
智库丛书

National Think Tank Series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美国 行为的根源

张宇燕 高程◎著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Conduct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智库丛书

National Think Tank Series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美国行为的根源

The Sources of American Conduct

张宇燕 高程◎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行为的根源 / 张宇燕, 高程著. —2 版.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3

(智库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7815 - 7

I. ①美… II. ①张…②高… III. ①政治—研究—美国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442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刘志兵 孙 萍
责任校对 张依婧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152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并指出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国家建设的核心议题。加强智库建设，成为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破解改革发展稳定难题、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的迫切需要。正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所指出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 年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国对智库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社会各界对智库

建设的关注度急剧上升，有关智库的研究课题日益丰富，智库正作为一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迅速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出版机构，积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高效率、高质量地出版一批当前智库研究的最新成果，责无旁贷、大有可为。

按照研究的对象不同，智库可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二者互相影响，不可偏废。基础研究是应用对策研究的理论基础，没有深厚的、科学的理论根基，智库学者不可能提出令人信服的对策，这样的对策也经不起理论的深究和实践的考验；而与实践脱钩的理论研究，缺乏现实观照的理论研究，也必然丧失其研究的现实意义。

科学的决策终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积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智库丛书”，即着眼于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百年”目标中的基础性、理论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包括对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国际、外交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属于智库的基础研究部分，但其又迥异于单纯的学术研究，更不是教科书式的研究。

“智库丛书”本着基础性、理论性、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的基本定位，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一高端智

库为依托，发挥其学科齐全、专家云集的优势，并与国内外其他一些著名智库建立联系，围绕中央决策急需的重大课题，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汇集当前智库研究的最新基础成果。智库研究的问题，既有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是将来的重大问题。智库研究不能盲目跟风，一定要对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有着理性的分析和判断，要以开放的视野对某一问题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的研究。当然，这也对智库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有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又要有对现实的观照。

相信这些智库成果的出版对智库影响力的提升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期待通过该丛书的出版，将智库的理论成果公之于众，成为智库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平台。

“智者不惑。”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号角已经吹响，一个崭新的智库时代正在召唤着我们前行。让我们以智库研究为契机，与各界有识之士，同心协力，为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努力。

《智库丛书》编委会

2015 年 12 月

目 录

一 引言	(1)
二 基督教传统与普世化价值	(16)
(一)无所不在的基督教的影响	(16)
(二)宗教信仰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 相互强化	(27)
(三)基督教一元论与美国式的道德标准	(36)
(四)基督教信仰与其制度的优越感	(43)
(五)“救世”情结与普世热情	(53)

三 商业理念与现实利益	(65)
(一) 实用主义哲学	(65)
(二) 福利至上原则	(78)
(三) 国际关系理论及外交实践中的现实主义 ...	(94)
四 精英主导与集团政治	(112)
(一) 阶级分层:对美国社会的纵向考虑	(114)
(二) 利益集团与党派政治:对美国社会的 横向考虑	(129)
(三) 以保护商业利益为根本的制度框架	(153)
结语 美国“三位一体”行为模式与对外 “二元”目标	(167)
参考文献	(191)
后记	(237)

引 言

六十多年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其经典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在凯南看来，分析美国当时的头号劲敌苏联之行为逻辑，应当成为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可以说他抓住了那个时代美国在全球面临的“主要矛盾”，明确且令人信服地——尽管存在争议——阐述了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所在和化解与制胜之道。凯南断言，1940年代的美国面对着这样一股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它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如果苏维埃政权要得以巩固，那么最大程度地削弱美国统治集团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力量不仅可取而且必要。如何对付苏联这一强大的政治力量，业已成为美国外交所面临的最重要之问题和最艰巨之任务。通过对苏联意识形态、社会制度、

经济效率和对外政策的分析，凯南充满自信地认为：美国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而且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这一问题；而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便是和其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苏“遏制”政策。^①

凯南写作此文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美国成为拥有全球一半以上工业产能的世界超级大国。凯南乃至美国整个决策层，关心的是谁会成为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以及如何应对挑战。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经过了三分之一世纪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实力获得了巨大提升，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日趋紧密。尽管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和所面临的问题和当年的美国不同，

^① George Kennan, 1947,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No. 4, pp. 566-582. 为了证明这种信念是可靠的，凯南给出几点重要的判断：第一，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苏联都可以轻易地退却；第二，苏联的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方世界所能达到的团结、坚定和强盛的程度；第三，苏联体制作作为一种政权形式，它能否成功，还没有得到最后的证明；第四，在苏联安全范围以外的所有关于苏联的宣传，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和破坏性的。凯南根据以上判断提出的遏制政策，可以简单地归纳为：研究对手—宣传—本国成功—对盟国的拉拢与指导—坚持信念和价值。具体来说，第一步是理解和认识美国正在应付的运动之性质；第二步是必须努力教育美国群众去了解苏联的真相；第三步是保障和增强美国社会自身的健康与活力；第四步是美国必须为其他国家规划并提出更为积极、更具有建设性，同时也是美国希望看到的那样一种世界的图景。

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性质也迥异于彼时的美苏关系。^① 然而至少在一点上今天的我们和当年的凯南处境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必须聚焦中国在当今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国际主要博弈者，探究其行为根源及逻辑，并以此作为中国在全球大棋局中进行博弈的战略依据。

在当今世界，对于美国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来说，美国无疑是头等重要的国家，美国强大的实力对其他国家而言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衡量一国综合实力之大小，一般而言有八项指标，即：经济规模，货币与金融，科学技术，人口、国土与资源，国际规则主导能力，军事防卫与打击力量，与主要合作者或竞争对手的关系，软实力。据此进行测度，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② 本书亦将

① 鉴于本书的关注点在于分析美国行为之根源，故除了在结束部分简略提及一下，我们不打算对中美和美苏或美俄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对后两个题目加以讨论的文献卷帙浩繁。对此议题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参阅埃兹拉·沃格尔（傅高义）主编的《与中国共处：21世纪的美中关系》（田斌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理查德·克罗卡特全面论述冷战的《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

② 其中经济规模实力主要包括GDP总量及人均GDP水平，产业结构分布，公司治理与政府管制，贸易总量和性质；货币与金融实力主要包括作为世界货币的影响范围和强度，凭借主导货币地位获得“铸币税”的能力，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有效性及规模；科学技术实力主要包括科技硬件存量，大学教育状况，研发体制，专利保有量；人口、国土与资源实力包括人口的数量、质量及年龄与种族结构，自然禀赋，地理位置，气候等；国际规则主导能力主要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区域制度以最

此作为分析前提。尽管不是一成不变，但美国曾经、眼下和今后一段时期内仍将拥有超级大国地位这一事实，一方面决定了国际问题无论大小几乎都与美国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美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前提和实现政策目标的保障。更有甚者，竟然有人将国际关系理论干脆称作一门“美国式的社会科学”^①。虽不无夸张，但其基本倾向我们大致是赞同的，因为无论是理解当今国际关系或预测明日世界格局走向，还是评估中国今天所处的国际环境并把握其未

大化自身力量，同时遏制竞争对手的能力；军事防卫与打击力量主要包括军费开支，军事人员素质，武器质量与数量，军工综合体效率，海外驻军与基地等；与主要合作者或竞争对手的关系，主要指与对方在静态与动态实力方面的对比，其间利益交叉的程度，对方对于己方价值理念的认同程度，特别是己方“盟友”的支持；软实力分两部分，内在软实力主要包括统治的合法性和财产的安全性，外在软实力系指该国在国际上靠说服、示范、道义而非强制的力量实现自身目标的能力。按照巴尼特的总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如今已经掌握了如下的物质力量：（1）拥有并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2）掌控了几乎所有的硬通货；（3）是世界商品的主要消费者；（4）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的制成品；（5）主导着国际资本市场；（6）具有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的能力；（7）控制着海洋航线；（8）从事着几乎所有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9）控制着尖端技术的教育；（10）控制着最新的宇宙航天技术；（11）控制着航空工业；（12）控制着国际通信系统；（13）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Jeffery R. Barnett, 1994, “Exclusion a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Parameters*, Vol. 24, p. 54.

^① Stanley Hoffmann, 1977,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edalus*, Vol. 106, No. 3, pp. 41 - 66.

来趋势，均应以对美国行为方式的深入讨论为基本出发点，均应对美国行为的根源有所了解。

同凯南探讨苏联行为时所持的理念一样，我们认为美国这样的国家之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此说主要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作为可以被“人格化”的国家，^① 总体而言它的行为是基于理性计算的选择，因而是可描述的、可理解的和可预期的。更进一步讲，我们的上述信念根植于以下四个基本判断或倾向。

其一，历史是起作用的。这句话的另一种表述是：未来发生的事件无法独立于过去。过去影响未来这句话至少有两层含义。它一方面是指特定人群的某些特征在时间的坐标中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或传承性，另一方面是说群体观念或行为特征的变化方向与节奏深受“路径依赖”的左右。说到稳定性或传承性，恐怕要首推那些被某一特定群

^① 把国家人格化的做法，至少在《奥本海国际法》中就有体现。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的标题就为“主权国家是国际人格者”，其进一步的解释为：“国际人格者在国际法上具有法律人格，是指它是国际法的主体，从而它本身享有国际法上所确定的权利、义务或权力，而且，一般地说，享有在国际上直接或通过另外一个国家（如在被保护国的情形）间接行为的能力。”“主权独立国家是主要的（虽然不是唯一的）国际人格者。”参见詹宁斯和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体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或文化传统，或简单称之为意识形态，亦即一种有内在联系的、通观世界的看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群体的偏好及选择往往深受其影响。至于“路径依赖”，它强调的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的干扰，同时某些事件之影响可能会被放大，其演化会有多种可能的结果或均衡状态，并将长期影响人类行为与资源配置过程。^①以“历史是起作用的”为起点，也意味着我们立足于长期分析，意味着我们对费尔南·布罗代尔的“长

^① “路径依赖”概念最初由布莱恩·阿瑟和保罗·戴维提出，诺斯随后将其创造性地应用于制度变迁理论之中。此概念的提出，意在让历史事件在解释结果过程中扮演相应角色，同时拒斥“历史乃必然性之载体”的宿命论。有关经济史中路径依赖的重要性问题，参见 Paul A. David, 1985,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Papers and Proceedings 332 - 337 (May); 1997,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Quest for Historical Economics: One More Chorus of the Ballad of QWERTY”,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Social History*, <http://www.nuff.ox.ac.uk/economics/history/paper20/david3.pdf>; Brian W. Arthur, 1989, “Competing Technologies and Lock - in by Historical Small Events”, *Economic Journal* 99, March, pp. 116 - 131。有关制度的路径依赖，见道格拉斯·诺斯和巴里·R. 温格斯特《宪法与承诺：17 世纪英格兰治理公共选择制度的演进》，载李·J. 阿尔斯通、斯拉恩·埃格特森等编《制度变革的经验研究》，罗仲伟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时段”^①、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②的认可。这让我们想起沃尔特·李普曼的一句话：“只要在向前看的同时记得往后回顾一下，我们便能够很好地区分表层现象和真

① 费尔南·布罗代尔将历史划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并以此作为解释工具来明确各种物质与非物质因素对于历史发展的不同作用。与三个时段相对应的三个概念分别为“结构”“局势”和“事件”。所谓“结构”是指长期不变或变化十分缓慢的，但往往对历史起深刻作用的一些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和思想传统等。在“结构”这一时间维度里，历史几乎是宿命的。所谓“局势”是指在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内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物价、产出、工资等因素的变化。所谓“事件”是指一些突发事变，如革命、条约、地震等，布罗代尔认为这些“事件”如同闪光的尘埃般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见费尔南·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学》，载《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3—204页。

② 黄仁宇认为，只有广泛地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压缩，形成一个思考中国历史的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并使之同欧洲史和美国史具有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对中国历史的进一步研究。他试图将“宏观历史”及“放宽历史视野”的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中去，形成所谓“大历史”观念。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大致有如下几层含义：其一，通过观察小事件总结历史大规律；其二，从长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出发，观察历史的脉动；其三，在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横向比较中，突出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问题；其四，注重分析历史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价值理念和制度之间的差距、行政管理技术同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社会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状况。参见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中国大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中文版自序“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实状况、暂时的原因同永久的因素、插曲与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之间的差别。”^①

其二，一国内部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的博弈塑造了国家行为。在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通过其对外政策得以展现，而政策又都是由人来制定和实施的。故国家行为的基础，在于那些由寻求精神价值实现和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人集结而成的集体行动；对国家行为最便捷和最有效的理解途径，来自对一国内部各集团或各阶级之间博弈过程的剖析。尽管我们不排除方法论个人主义，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遵从的主要是方法论集体主义，其中既包括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②，也包括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密切相关的奥尔森的集体行动或

^① Walter Lippmann, 1943, *U. 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Little Brown, p. 183.

^②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写道：“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1—122页。关于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可参见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第二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利益集团分析^①，并将重点置于阶级或集团间博弈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之上。方法论集体主义的一个推论是，恰如戴维·兰德斯所指出的“宏大的过程需要有宏大的原因”^②，在分析时我们需要舍弃掉那些无关宏旨的细枝末节而抓住超越个体差异的一般特性。对此，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还讲过一句颇为经典的话：“无疑，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可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③作为一种信念，我们认为，在那些永无休止的学术辩论、纷繁复杂的朋党纷争和貌似矛盾的民族性格背后，应该存在着某种一致的、持久的及相互协调的美国行为逻辑。

其三，外交服从于内政。虽然在汉斯·摩根索、肯尼思·华尔兹、约翰·米尔斯海默等学者的眼中，国家

① 参见曼瑟·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② 参见David Landes, 1994, “What Room for Accident in History? Explaining Big Change by Small Events,”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7, No. 4.

③ 亚历克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58页。托克维尔是为数不多的非马克思主义者中信奉方法论集体主义的重要学者。